

#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出版活动<sup>①</sup>

魏启元

## 一、历史背景及出版事业的地位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9月22日、23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形成。同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大部分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中国共产党预见武汉战略地位将日益重要，派出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组成的强大阵容来到武汉，对内以长江局的组织形式，指导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对外以中共代表团名义，继续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10月，成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7年12月21日晚上，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等，在武汉就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同蒋介石会谈，其中谈到出版日报问题，蒋介石同意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新华日报》。这样，筹备就绪的《新华日报》才得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1937年12月11日先在武汉创刊的《群众》周刊，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阵地，从此，国民党垄断舆论的局面被打破。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党派、各文化出版机关、社会团体、各种学校，也相继

集中到武汉。一大批新闻出版知名人士及作家，也都陆续来到武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武汉集中了 50 多家出版社和近百家杂志社，成为全国出版中心。

## 二、中共在武汉领导的新闻出版事业

### （一）党中央十分重视新闻出版工作

中共中央对党报党刊在武汉公开出版向全国发行非常重视。193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创办全国性报纸期刊的重要作用，要求每个党员通过认真阅读《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指示中具体规定：“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一）《新华日报》上的社论（二）《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 必须在支部及党的各级委员会讨论研究”。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对新闻出版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和关怀。《新华日报》的筹备和创刊，他进行了精心策划和顽强的斗争，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同时他还时刻关心着报刊的印刷、出版、发行和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新华日报》创刊不久，他又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群众》的编辑方针作了指示，他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是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它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1938年4月下

旬，夏衍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工作时，对夏衍说：“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又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毛泽东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在1938年5月发表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科学论断，作了多次报告，积极宣传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际宣传组，翻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会见了邹韬奋，对邹韬奋及他的事业以极大的关注，并经常挤时间阅读他的著作和刊物，给予很高的评价。邹韬奋后来不止一次的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武汉，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曾应邀到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作形势报告，鼓励书店职工坚持抗日、进步的出版工作。周恩来在武汉还十分关心和支持《鲁迅全集》的预订和出版工作。周恩来在武汉时期，不仅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功绩，对新闻出版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中国共产党全国性党报党刊在武汉创刊

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出版，全国人民感到欣慰和鼓舞，同时也突破了国民党统制舆论、蒙蔽人民的专制统治。

《新华日报》成为在国统区团结人民，揭露敌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新华日报》在武汉期间销售量最盛时为3万多份，仅武汉地区发行万余份，1938年10月25日迁重庆出版。除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编辑出版的《新群丛书》

外，还有中共在武汉建立的中国出版社和生活、新知、读书三书店出版的书刊，以及延安出版的各种书刊。

中国共产党经过同国民党斗争于 1937 年 12 月 11 日在武汉创刊了理论性的党刊《群众》周刊。该刊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刊登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在理论和指导思想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群众》周刊在武汉销量为 2 万多份，武汉沦陷时迁重庆出版。

### （三）建立和发展党的出版机构，团结进步出版发行业

1938 年春，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在武汉建立了中国出版社。中国出版社主要出版和重印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及延安的出版物。许多书籍的出版，采取从延安将纸型或原稿送往武汉，在延安和武汉几乎同时出版，中国出版社在近 10 个月的时间里，出版了几十种书籍，使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在国统区广泛发行。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革命书店，1937 年底迁往武汉后，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出版方向，担负起革命出版工作的重任，积极出版马克思列宁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大量出版各种抗战、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战信心，获得了各阶层广大读者的信任和支持。并以武汉为基地发展到华南、西南、西北地区各大城市开设分店。据生活书店汉口总管理处统计，该店在 1938 年上半年，在武汉就出版新书 69 种，印数达 56 万余册；再版书 74 种，印数达 73 万余册；杂志初版共印 123 万余册。书店的出版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抗战开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建立了扬子江出版社，共出

版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宣传抗战的书籍 20 余种。后和新知书店联合建立新知书店襄阳分店，以配合鄂西北地区的工作。1937 年 12 月，通俗读物编刊社由西安迁往武汉，在武汉期间，编辑了五六十种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交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1938 年 2 月 14 日，周恩来在武昌会晤冯玉祥，其中周恩来谈到：宣传抗战，须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如印刷、报刊等。冯玉祥即在汉口建立了“三户印刷社”，印刷出版抗战书刊。它的“三户印刷社”还大量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冯玉祥还请老舍主编由他创办的《抗到底》半月刊。上海杂志公司在抗战爆发后由上海迁到武汉，在武汉出版了大量的抗战图书和刊物。许多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如田汉、刘白羽、老舍、艾青、丁玲、安娥、洪深、萧红等许多人的作品，都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另外，海燕出版社、大众出版社、全民出版社、群力出版社、华中图书公司、黎明书局、天马书店等，也都出版了许多抗战、进步书刊。

#### （四）出版了大量的图书

抗战初期，中国出版社在武汉出版的图书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除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外，还出现过其他出版社名义翻译出版的在全国属于第一版的马列著作。

1938 年 5 月，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全文刊登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因王明的阻挠未能刊登。《新华日报》出版的《新群丛书》出版了上述两种军事著作的单

行本，《新群丛书》在报纸上介绍《论持久战》一书时强调：“本文可说是第三期抗战后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凡军事家及救亡工作者，均宜精研细读，本文实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

抗战初期，武汉的图书出版中，以各种“丛书”最有特色。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间，各出版社出版“丛书”或“丛刊”共51种，包括了500多种图书，当时最有影响的是《新群丛书》，它主要出版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其中有：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朱德《我们怎样打击敌人》、《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论目前抗战形势》、《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博古《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其前途》等，共出版图书44种。生活书店出版的丛书有：钱俊瑞主编的《黑白丛书抗战特刊》在武汉出版25种，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战时丛书》在武汉出版6种，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书》在武汉出版6种，邹韬奋、金仲华、艾寒松、张仲实主编的《问题与答案丛书》在武汉出版10种，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在武汉出版8种；以及《战时社会科学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青年自学丛书》、《大众读物丛书》、《战时教育丛书》等丛书，包括了百余种图书。新知书店出版的丛书有：胡绳主编的《救中国通俗小丛书》及《战时问题丛书》等。扬子江出版社出版的丛书有：《实践丛书》。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丛书有：《大时代文库》、《大时代丛书》、《战地报告丛书》、《战士生活丛书》、《游击队小丛书》、《抗战戏剧丛刊》等。华中图书公司出版有：《抗战丛书》、《抗战戏剧丛书》等，还有许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各种宣传抗战的丛书。以上这些丛书所包括的图书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李富春、陈毅、博古、陈绍禹的著作外，还有宋庆龄、郭沫若、冯玉祥、李公朴、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胡绳、金仲

华、张仲实、田汉、夏衍、丁玲、阳翰笙、老舍等人的著作，以及 200 多名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著作和作品。抗战初期，武汉地区的出版社，出书范围十分广泛，门类丰富，作者众多。据统计，当时有 50 多家以出版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共出版各类抗战的和进步的图书达 550 余种。

### （五）抗战、进步刊物出版兴盛

抗日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武汉地区各类刊物的出版。胡绳于 1937 年 9 月 2 日在汉口写给《抗战》三日刊第十七号的一篇《武汉通讯》中说：“抗战刚爆发以后，武汉的书店就拿不出一本新出的刊物和书籍，过去的武汉是一片沙漠。但据我所看见的这片沙漠现在是慢慢地长出红花绿草了。”到 12 月，武汉地区的刊物已达 30 种左右，随着形势的发展，到 1938 年 3 月已达 67 种，到抗战一周年前后，超过 100 种，以后刊物出版高峰时达到 180 余种。有一些进步刊物，一直到武汉陷落前还在坚持出版。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1938 年 7 月 7 日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时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 30 万份，发行地区扩大到各省重要城市及香港等地。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出版或迁往武汉出版的进步刊物还有：军委会第三厅主办，张申府、钱俊瑞主编的《抗战新闻》；张仲实主编的救国会刊物《国民公论》；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胡绳主编的供工农大众阅读的通俗政治读物《救中国》；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战时特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刊《战时青年》；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茅盾、适夷、叶圣陶、宋云彬主编的《少年先锋》；徐步、史枚主编的《新学识》；戴伯韬、刘季平主编的《战时教育》；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由姚蓬子主编的《抗战文艺》；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扬、夏衍等任编委由臧云远、孙陵编辑的《自由中国》；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老舍主编的《抗到底》；胡风主编的《七月》；田汉、马彦祥、洪深主编的《抗战戏剧》等。

### 三、意义及其影响

（一）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给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刊创造了条件。它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书籍，向全国发行，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及交通可以到达的广大地区，通过各地进步书店、代销机构及各种发行渠道，使它的出版物和进步书刊，广为发行，出版物的作用和影响，更加深入。据当年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回忆说：《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尽管出版在遥远的武汉，可是报刊出版三四个月之后，他们也能辗转看到，从中了解中共的方政策和抗战形势，掌握斗争的方向，并作为部队的学习材料。在行军中，他们用油纸精心包裹每一张来之不易的《新华日报》。一张报纸一份刊物在部队中传阅三四个月仍然完好无损。甚至许多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和秘密活动中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他们通过公开发行的中共报刊和图书来加深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制定具体的斗争策略。

（二）在经历了十年内战以后，党在武汉这个宣传阵地，大量出版并向全国发行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出版物和各种抗日、进步书刊，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对武汉 1937 年 7 月以后至 1938 年 2 月底这一时间在武汉所有公开发行的全国出版的图书和刊物，进行普遍审查后认

为“目前出版界已全数集中武汉”，于是他们尽数搜集，逐一审查。审查结果，国民党中宣部惊呼“无论书籍刊物，皆共党及左倾色彩占极大多数，尤以书籍为最，有关共党者若将左倾及人民阵线者加在一起，已超过总出版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影响亦殊骇人”<sup>②</sup>。这就证明当时抗日、进步书刊出版发行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

（三）抗战初期，由于中共在武汉十分重视新闻出版事业，在武汉集中了一大批知名进步新闻出版人士及党的新闻出版干部，在这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有强大战斗力的新闻出版队伍。在以后的国统区、各个抗日根据地及抗日军队中，开展新闻出版工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大批知名进步新闻出版工作者，以及进步作家，几乎都在武汉战斗过，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由于革命书刊和进步出版物的影响，引导了大批知识青年和学生，走向革命的道路，许多革命青年以后成了党的骨干和重要领导干部。

（四）抗战初期在武汉，中共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领导了武汉出版界反对国民党查禁抗日进步书刊的斗争。国民党当局置日寇大举进攻于不顾，竟然在武汉制造了种种不利团结抗日的查禁救亡书刊的事件，激起了新闻出版界、著作界以及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这场斗争中，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对国民党当局践踏出版言论自由的行为，给予了坚决地揭露和打击。在武汉，结成了反对查禁抗日进步书刊斗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1938年9月10日，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新知书店、黎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等16家书店联合署名的《武汉出版界请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检查办法》，在报刊上发表。针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邹韬奋在武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

场斗争，在全国引起广泛的支持和强烈地反响。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版；《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群众周刊大事记》红旗出版社版，《新华日报史》重庆出版社版；《生活·读书·新知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集》；石西民《火红的岁月》；《抗战》三日刊合订本，上海书店影印版；《邹韬奋》湖北人民出版社版；《湖北出版史料》第一、二、三辑。

原载《湖北出版史料》第三辑。作者魏启元（1927— ），山东莒南人。曾任湖北省出版局研究室主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党史办主任、湖北省出版志主编。

原注：张克明《抗战初期武汉出版界实况》，《湖北出版史料》第三辑第 29 页。

## 周恩来对出版工作的关怀<sup>①</sup>

徐雪寒

1998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鞠躬尽瘁，办了许多好事，做出了辉煌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大后方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时，直接领导我们三家书店工作，据我所接触和知道的几件事情，凭记忆所及作一简略的回顾，以为纪念。

—

1939年，国民党当局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形势恶化。当时新知书店总管理处设在桂林，日常工作由华应申主持。为了便于接受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同时也为了就近处理中国出版社的业务，我常驻重庆。原来在武汉，亲知书店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凯丰领导。到重庆后不久，由南方局徐冰领导，但周恩来对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经常亲自给以指示。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新知书店的金华、丽水、常德、宜山、衡阳、辰溪、襄阳等地分支店陆续被捣毁、封闭或强迫“自动停业”，干部被逮捕或被勒令限时离境。最后只剩下桂林、贵阳（和读书出版社合营）、昆明、

重庆四个分店。生活书店分支店多，影响大，遭受迫害更为严重。

周恩来对我们三家书店的情况十分了解，知道我们在大后方面临困境。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在 1940 年夏天，他要我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的负责人徐伯昕、黄洛峰一起到红岩咀 13 号八路军办事处去谈话，因日机轰炸，谈话临时改在防空洞里进行。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指示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很需要我们，三家书店可联合派出干部，以民营企业形式去设立出版机构。我们欣然遵办。生活书店派出重庆分店经理李济安，读书出版社派出赵子诚，新知书店派出重庆分店经理徐律和陈在德、王德珍等，兵分两路，携带纸型、书籍和资金等前去太行和延安等地，开设了华北书店。这是三家书店联合经营的开始。延安的华北书店后来还出版了不少新书。太行的条件艰苦，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印刷设备，远在重庆、桂林的母店，正处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之中，且路途遥远，也不可能给以支援。他们在货源断绝后，就自己油印各种书籍。白天卖书，晚上刻蜡版，印刷装订，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还组织流动供应队，翻山越岭，活跃在太行山区的辽县、武乡、黎城一带，深受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项工作既为抗战文化做出了微薄的贡献，也使三家书店的干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40 年 10 月，新四军渡江东进，奉周恩来的指示，新知书店派出上海办事处主任王益和汤季宏、王宏，生活书店派出编辑袁信之，读书出版社派出张汉卿等前去。取三人为众之义，在苏北盐城、海安、黄桥等地设立大众书店。1941 年夏，日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众书店转入农村活动，后来又成为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个出版机构。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今年冬天，周恩来还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从新知书店挑选

一批能做买卖的可靠党员干部，到江西、福建、浙江一带设四五个灰色书店、文具店等，隐蔽待命，准备在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次年2月，我陆续挑选曾霞初、李志国等和周恩来从重庆派来的张纪恩，共六人，分批出发。这一特殊任务由于受到皖南事变和日寇侵犯浙赣线战事的影响，没有圆满完成。派出的干部后来有的回到重庆复命，有的撤回书店，有的虽在当地建立了机构，也都没有启用。

## 二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新知书店设在桂林、贵阳、昆明的分店被查封或勒令停业。三家设在贵阳的分店，资产（包括房屋）被查封，负责人孙家林、周积涵等都被关押在贵阳的监狱里，直到三年以后，才越狱归队。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设在云岭的随军书店在突围中被破坏，两店负责人方钧和朱晓光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朱晓光一年后越狱归队，方钧在赤石暴动中壮烈牺牲。最后，三家书店都只剩下了重庆一店，处境都很困难。皖南事变发生时，我正在桂林，根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的“分散、转移、隐蔽”的指示，我和华应申等转移到了上海“孤岛”，桂林保留一个办事处，只有少数几位干部维持工作，由许静负责。多数干部转移到了其他单位，以便相机为筹设第二、三线机构作准备。在这之前几天，重庆分店经理岳中俊和几位党员干部在《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庆祝会上，听到周恩来在大会讲话时宣布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这时电灯突然熄灭，过一会复明。周恩来语意双关地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会场气氛一下激动起来。散会时已夜深人静，他

们在回来的路上，怀着满腔悲愤，低声议论，表示一定要和反动势力坚决斗争到底。岳中俊接到总管理处布置撤退应变措施，就分店的工作部署问题，请示徐冰，周恩来立即亲自接见。接见时岳中俊把分店干部的悲愤情绪和斗争决心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对岳中俊说：“几家书店（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社会上有影响，有的称你们是进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抗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共产党的书店。如果国民党把这些书店封了，那事实就揭露：‘是你国民党不要进步，不要抗日，破坏团结。’重庆是陪都，政治中心，国际国内注目；它如果封书店，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因此书店要坚持开下去，等它来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自然也要作最坏的准备。”<sup>②</sup>隔天，徐冰又代表周恩来到分店，向党员干部讲了书店要坚持下去的意义。针对他们年纪轻，大多是新党员，缺乏斗争经验等具体情况，还特别讲了遇到被捕、坐牢时如何应付，遇到叛徒时又如何对待等等，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同时，岳中俊还作了精简人员，疏散存货；在遭到封闭时尽可能减少损失的两手准备，使分店干部充分认识到重庆分店的坚持开业和关闭，已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局性的政治策略问题。书店照常开业和被迫查封，政治上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坚持就是胜利”也就成为分店全体干部的头等政治任务。这就样，在大后方唯一公开营业的新知书店，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坚持了下来。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也都作了相应的准备。

### 三

我和华应申撤退到上海不久，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上

海“孤岛”，我们又先后奉命去了苏北敌后根据地。我们撤离桂林后，在桂林的新书店总管理处由沈静芷继任经理。他以秦记西南印刷厂经理的名义从事活动，同时开设了二、三线机构，经营出版和副业，并以副业养出版，取得了一定成效。

1942年和1943年，沈静芷奉南方局桂林统战委员会之命，先后两次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桂林地区党的出版工作。在重庆曾家岩50号二楼，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他还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对国统区出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他们继续搞出版，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要团结有进步倾向或处于中间状态的党外出版发行同业，共同抵制并孤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出版发行机构。在1943年那次汇报时，周恩来预见到日寇将进犯湘桂，国民党军队必然节节溃败，对三家书店如何部署撤退问题，一一作了周详的指示。周恩来既严肃又风趣地说：“撤退，军队是家常便饭，临到你们搞书店的，就不那么简单了。你们都是有家当的，是舍不得瓶瓶罐罐的。当然，这些确是党的资产，不能随便丢，但主要是人，是干部，是群众，安全转移，保存了他们，一切好办了。以我看，你们是不是兵分两路，到时候，一路从陆路向西撤，到重庆来赶热闹，配合主力；另一路，从水路向东撤，那边是山地，有十万大山，什么都有，地势很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必要时，组织当地人民，干它一家伙。要不要颁发一个书店纵队的番号？回去告诉三家书店的同志，要吸取1938年长沙撤退时大火的严重教训，提高警惕，事先作好准备。撤，就是要大家去撒革命的文化火种！”周恩来的重要指示由沈静芷带回桂林向党组织汇报并告诉三家书店的同志，大家心情激动，充满胜利的信心。次年9月，日寇向湘桂全线进犯，三家书店所属机构的干部，连同存书、纸型、资料和印刷器材等，在日寇逼近桂林前夕，分别由沈静芷、曹健飞带队，由水陆两路撤离桂林。曹健

飞等在桂东建立了兄弟图书公司，抗战胜利后迁往广州。沈静芷等由陆路撤退到重庆，周恩来指示他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把集中的人员分散安插到有关单位，渡过人员过于集中、经济负担过重的难关。

#### 四

1943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以三家书店为核心的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简称新联总处）在黄洛峰、薛迪畅、沈静芷等主持下宣布成立，它是重庆出版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定期聚餐的形式，座谈时事和讨论新出版业面临的种种问题，具有“联合会”的性质。所以不叫“联合会”，是为了避免登记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利于开展工作。“新联总处”广泛团结了当时在重庆的张静庐经营的上海杂志公司、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屋等13家私营出版社（不久发展到20余家，战后发展到50余家），次年5月和8月在重庆、成都建立了联营书店，开始冲破了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新出版业处于被动窒息的局面，也为新出版业联合起来从事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在大后方，三家书店的工作目标和宗旨一致，同志间团结互助，友谊深厚。当时也都实行低薪制，但经济实力和经营管理略有不同。有同志戏称新知书店经理为“草鞋经理”。这虽是戏称，也说明新知书店干部生活的艰苦。周恩来对我说过：“你们的低薪制，远比根据地的供给制艰苦，很难设想你们怎样熬过来的。”这当然是过奖。但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督促。生活书店社会影响大，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历尽浩劫，经济上也已被严重削弱。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要设立门市部，感到困难。周恩来立即指示

上海党组织给以 100 两黄金的资助<sup>③</sup>。同时，生活书店战时的副业经营在三家书店中也搞得较好，认真贯彻了“以副业养出版”的方针。这样，生活书店在党的关怀和全体同志的努力奋斗下，上海分店在抗战胜利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在 10 月初便在上海重庆路迅速复业开张，赶在了国民党党办的出版机构的前面，与分别了八年之久的上海和新收复区广大读者见面，为他们及时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深为社会各界所称誉。在此前后，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也相继复员到了上海，三家书店继续联合在一起，在国统区出版界形成了传播进步文化和促进民主政治的核心。

我们三家书店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当局一再摧残，日寇侵略战争不断轰炸破坏，而终于赢得了胜利，并于 1948 年 10 月在香港实行全面合并，建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继续做出贡献，固然要靠全体同志一致努力，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有力支持，但是我们决不会忘记，每当关键时刻，周恩来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是他为我们指出了前进方向，引导我们得以走出困境和险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对我们三家书店来说，是多么珍贵和令人怀念啊！

原载（中国出版）1998 年第 6 期。作者徐雪寒（1911— ）1935 年新知书店创办人之一，任经理。1936 年任《救亡情报》主编等。抗战爆发后，继续领导新知书店的工作。现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著有《徐雪寒文集》。

参见岳中俊（雾重庆中传新知）一文的第二节，载《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第 280 页，1994 年三联书店出版。

参见《生活书店史稿》第 368 页，1995 年三联书店出版。